
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构想

李金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华北、华中及华南等19个省的广大地区,建立了19块大小不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抗日根据地犹如插在敌寇后方的一把尖刀,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并逐渐显示出重要的作用。国内外学者一直将此视为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当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又要看到某些不足。最明显的不足就是研究课题还不全面,对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尤其是普通民众生活的研究,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与整个中国现代社会史领域研究的滞后是一致的。本文主要就为什么应该研究抗日根据地社会史,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以及如何研究,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和设想,权当开台锣鼓,希望引来学贤参与讨论和研究。

—

笔者认为,社会生活应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抗日根据地社会史是研究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外内容的,其中更多的是研究抗日根据地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这种概括是否合适,有待讨论,随着具体问题研究的开展和逐步深入,也许会越来越明了。我想,在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尚在起步之时,更重要的是把需要研究的具体内容展示出来,供人们参考。当然,这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参照一般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并结合抗日

根据地社会史含义的表述以及抗日根据地的特点提出的。

笔者以为,抗日根据地社会史至少应该研究以下几个内容,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问题。

(一)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构成

要研究并说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应当首先弄清这个社会的构成情况,这是社会史研究内容最多的一个方面。构成社会的主要因素有人口、家庭与婚姻、宗族、阶级阶层、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民族等等。

人口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是构成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因子,离开了一定数量的人口及其社会行为,任何社会活动都不可能存在,所以研究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结构,不能不研究人口问题。研究抗日根据地的人口,一是研究抗日根据地的人口演变,即人口数量的增减;二是研究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分布,即人口的地域分布;三是研究抗日根据地的人口构成,即人口的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自然构成指性别构成、年龄构成,社会构成指民族构成、职业构成和文化构成;四是研究抗日根据地的人口素质,指身体素质、文化技术修养和思想道德水平;五是研究抗日根据地的人口流动,即人口的迁徙。对于抗日根据地人口诸方面的研究,都要注意抗战前后的变化、变化原因及其社会影响。由于抗日根据地始终处于战争频繁的恶劣环境,管辖范围也时有变化,人口问题遂带有强烈的战时特点,研究难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家庭是社会构成的细胞,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单位,是探究社会构成的重要窗口和突破点。家庭又是因婚姻而形成的,故应与婚姻一起来探讨。研究抗日根据地的家庭与婚姻,要研究其诸方面在抗战前后的演变,譬如抗日根据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地位、权利和义务,家庭的生产、消费、生活及养教职能,婚姻形式、婚姻动机、择偶标准、婚姻程序、婚姻生活等。其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和研究。家庭与婚姻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价值极

高。

宗族或家族,是家庭关系的扩大,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群体。家族在中国农村社会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抗日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传统的家族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一方面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前家族的形成、家族族规、家族族长及成员的权利义务、家族的宗祠、族产以及家族的社会影响;同时,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家族凝聚、分合及解体的变化,尤其是家族在抗战时期社会生活诸方面的作用。

阶级阶层,是阶级社会中的基本构成,是人们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的客观反映。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阶级分析。中国历史学者在阶级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但也有不少缺陷,譬如主要限于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斗争,从社会史角度来研究阶级阶层的成果不多。对于抗日根据地的阶级阶层,我们要研究在根据地内主要有哪些阶级阶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如何;与抗战前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原因是什么,这些变化产生的社会效果如何。阶级阶层的变化,是抗日根据地社会构成的重要特点,应作为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的重要内容来研究。

社会群体,是人们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集合体。社会组织,则是为了一定目的自觉结合的社会群体。这些也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内容。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前有哪些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到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这些群体和组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化原因是什么,在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哪些作用。另外,更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新产生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及其组成形式、活动内容、社会作用,与抗战前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相比有什么不同。

民族,也是社会构成的内容之一。要研究抗日根据地的民族状况,以及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等,与抗战前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各民族在抗日斗争中的表现,等等。

(二)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生活

这里所谓社会生活, 不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 而是指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方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种习俗, 也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之一。

社会生活可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部分。

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 主要是指物质生活的社会面貌及其特点, 通俗点说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研究抗日根据地人们的物质生活, 主要是弄清人们穿戴的质地、样式, 食物的构成及比例, 常用的器物, 居住的形式、条件等, 这些与抗战前相比发生的变化, 变化的原因和社会影响。

精神生活, 主要指社会成员的文化娱乐活动、宗教活动等。要研究抗日根据地人们的精神生活在抗战前后有些什么变化。

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有时是很难截然划分开来的。譬如婚丧嫁娶、岁时节令等, 这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而且物质与精神合二而一。在研究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生活时, 对此也不可忽略。

(三)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关系

人际关系无时不有, 无处不有, 人际关系也是社会史研究中心必须注意的课题。人际关系, 包括亲戚关系、邻里关系、老乡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师徒关系、官民关系、上下级关系、不同阶级阶层及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等等。研究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关系, 就是研究上述人际关系在根据地的实际状况, 与抗战前相比有哪些变化, 变化原因是什么, 这些变化对根据地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从称谓上也能反映出人们之间的关系。在抗日根据地, 人们的互相称谓发生了一些变化, 如果能弄清各种称谓变化的形式、原因及其反映的社会问题, 肯定是一篇不错的文章。

(四)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意识

这里的社会意识, 不是指以思想家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意识, 也

不是指政治领袖的社会意识,而是指普通民众的社会意识。社会精英意识也好,政治领袖意识也好,只有当它们为普通群众接受以后,才成为社会意识。社会意识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意识、伦理道德意识、宗教信仰与迷信等。研究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意识,主要是研究普通民众对根据地政治的认识以及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譬如,在抗战前,农民“家”的意识是很浓厚的,政治感觉麻木,政治参与意识淡薄。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农民“国”的意识升华,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支持抗战。我们要研究民众在抗战前后政治意识的变化、变化原因及结果。研究抗日根据地的伦理道德意识,主要是探讨民众对生活、对人际关系的观念以及民众在社会生活、人际交往中的准则。譬如,封建的传统伦理道德在抗战以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原因是什么,这些变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研究抗日根据地的宗教信仰与迷信活动,主要是研究有哪些宗教信仰、迷信活动,特点是什么,与抗战前相比,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原因是什么,说明了什么社会问题,意义何在。

(五)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主要指社会弊端,如赌博、贿赂、卖淫、盗匪等。这些社会弊端是社会的毒瘤,对民众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秩序的影响至深且远。这些弊端是如何产生的,历代的防治措施及效果如何,一直是社会史学者所关注的课题。那么,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这些社会弊端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减弱了,有无新的社会弊端产生,为什么?根据地采取了哪些防治措施,社会效果如何?这些都是研究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的重要内容。

最后,灾荒及其防治也是社会史研究的课题。灾荒反映出自然人类的逼迫关系,也反映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属于社会问题。灾荒有水灾、旱灾、虫灾、地震、瘟疫、火灾等。防止灾害发生,以及灾害发生后救灾、抗灾,是社会的功能之一。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所发生灾荒的种类、规模,在于破坏程度,灾荒发生的自然原因与社会因素,以及防治灾荒的措置、方式和效果。同时,应注意防

灾、抗灾手段与抗战前有何不同，并追溯其原因。

二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即如上述，在此基础上能更好地理解研究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一、丰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内容

80年代中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恢复，并陆续出版了一些令人可喜的学术成果。但就总体而言，喜中有忧。有不少领域和课题尚未开拓，空白点还不少，中国现代社会史领域（1919—1949年）鲜有人问津，即是明证。1986年至今，全国共召开了五次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未有一人提交有关中国现代社会史的论文。可见，社会史学者的目光尚未注视中国现代社会史领域。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现代史学者的研究嗅觉不够敏感。不管怎样，只有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中国社会史研究才称得上比较完整和系统。包括抗日根据地在内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史尤其值得注意和研究，因为与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变化是巨大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无论是社会构成、社会生活，还是社会关系、社会意识，都以前所未有的面目出现。我们在研究旧中国社会史的同时，更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史的研究上。

第二、拓宽抗日根据地的研究领域

抗日根据地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有机整体，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内容，也包括社会方面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抗日根据地研究，经过了从局限于政治军事到也重视经济文化的演变，这与新中国整个历史学的发展走向是基本一致的。问题是

参见《历史研究》1987年1期、1989年4期、1991年1期、1995年1期等有关社会史研讨会综述。

80年代中以后，中国现代史学界未能跟上时代学术潮流，开拓中国现代社会史领域的研究。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据笔者统计，1949年至1994年，正式发表的论文及资料共130余篇，其中称得上社会史论文的只五六篇，晋察冀根据地还是研究得比较好的，其他根据地可想而知。总之，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还是空白。事实上，这种局面已经和正在严重阻碍着抗日根据地的继续研究。一是抗日根据地史的内容本来是立体的、丰富多彩的，而现有的研究却多少显得面孔单一，生气不足。另并，有许多问题，仅从政治、经济、军事去解释，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譬如，在抗日根据地，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农民能踊跃支持和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以及广泛发动农民，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仅凭此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如果能找出支持抗战、参加抗战的宗族基础、阶级基础、组织基础、社区基础、民族基础以及社会意识的变化等因素，也许能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三、研究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的现实意义

研究社会史，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抗日根据地社会状况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明显。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各方面，很多是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继承和发展下来的。至今，中国有哪些社会现象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抗日根据地时期，这是研究抗日根据地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另外，研究社会史的现实意义还体现在应用性和教育性上。譬如历史电影、历史戏剧和历史文学作品等，应用性和教育性都很强。无论是描写历史人物，还是叙述历史事件，都必须衬托当时的社会氛围，表现当时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社会意识，这是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作者不懂得当时的社会史，如果历史学者不提供相应的社会史成果，作者能写出成功的作品吗？

三

如何开展和加强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学者尤其是抗日根据地研究者面临的难题。笔者认为,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学习有关理论

笔者认为,研究抗日根据地社会史,需要学习的理论分三个方面,一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借鉴外国社会史学者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三是学习与社会史相关的学科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史研究内容和精辟论述,这主要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史学科的影响,连西方社会史学家也是承认的。美国社会史学家伊格尔斯在评论欧洲异军突起的社会史研究时曾说:“新社会史的诞生是多重影响的产物,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结合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这种评价是颇有代表性的。

当然,仅限于学习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关社会史的论述还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毕竟不是专门研究社会史的,他们的著作所涉及到的,远不是社会史的全部,像下层社会的家庭、婚姻、宗族、宗教、娱乐生活及其生活方式等,他们就没有深入研究过。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地位、作用等,他们也未曾做过理论的系统的论述。有鉴于此,我们还要借用西方社会史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毕竟,西方学者最先提出和建立了社会史学体系,他们的研究成果最丰富,研究手段也最发达。我们对西方社会史学流派的名作,应认真阅读,并汲取有益的成分。象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

(美)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第 191 页。

会》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屈维廉的《英国社会史》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斯莱特的《失去的世界》等社会史代表作，都很值得研读。

此外，我们还要引进与社会史相关的学科理论及方法，譬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以及结构理论、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互动理论、角色理论、个案研究法、统计调查法、计量研究法等。西方学者运用相关学科成果理论研究历史，是比较早的，而且成效非常显著。中国学者则做得很不够，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分析乏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拆除学科间的高墙，实施“学术杂交”已成趋势，历史学如果忽视相关学科成果的运用和借鉴，是不可能有所突破的。我们一定要补上相关学科理论这一课，以适应历史学的发展。

第二 挖掘社会史料

关于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的资料，无疑是相当丰富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掘。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搜集资料。

首先，应搜集历史文献资料。

文献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价值的文字、声音和形象的记录，包括报刊、图书、档案等文字记录以及照片、录音、录象等声象记录。抗战时期及其后几年印行的有关图书，是研究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例，当时印行出版的有关图书资料就有一百四五十种，出版的报刊也很多，仅专区以上就办有几百种。在冀中区，曾先后出版了冀中区级至县级的各种报刊 125 种，至于党内报刊，尤其是县委一级的支部小报，就更多了。在冀东区，也曾先后出版报刊达 65 种。在晋察冀边区，较

参见周元正：《抗日战争史参考资料目录》，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见《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1 页。

见杜敬：《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一百二十五种报刊》，《社联通讯》增刊(1)，1985 年。

见马建国：《冀东书报刊史料》，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50—76 页统计。

有影响的报刊有晋察冀中央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初名《抗敌报》)、晋察冀边区党委的机关刊物《战线》、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抗战建设》、《边政往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抗敌三日刊》(后改名《子弟兵报》)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晋察冀社会史的重要报刊资料。另外，抗日根据地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可谓浩如烟海。在今中央档案馆、山西档案馆、河北档案馆以及市县档案馆，都藏有丰富的档案资料。连保存民国档案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也藏有根据地的情报。档案资料具有原始性、权威性，是第一手材料，更值得挖掘、整理和利用。但因分散、零乱，工作量相当艰巨。还有一些当时保存下来的照片资料，也很有用，通过这些可以发现和验证当时的一些社会景象。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80年代后，中国现代史学界搜集和整理了不少抗日根据地史资料，尽管不是专门的社会史料，但也可资利用。

另外，应调查活资料。

社会史的特定内涵，使它不仅要求掌握“死”的社会史料，还要搜集当代“活”的社会史料。调查可采取访谈知情人、问卷调查及实地观察等方法。通过调查，可以获得许多在图书馆、档案馆无法得到的生动资料，对正式印行的文献资料是极好的佐证。抗日根据地时期距今半个世纪，一些亲闻、亲见、亲历者还在世，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最深切的感受和了解。应抓紧时机，抢救这些活资料，否则悔之晚矣！

再者，了解革命文物遗址资料。

文物遗址是历史留下来的实物、实景，保留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譬如位于冀中清苑县的冉庄地道战遗址，国务院规定该村要基本保持原貌，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对我们认识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原貌很有帮助。但总的说来，抗日根据地文物搜集工作还较欠缺，对遗址保护得还不够。时至今日，我们历史学者也应负起责任，发掘保护革命文物遗址，以利研究历史，教育后代。

最后，应重视文艺资料。



笔者以为,与政治史、军事史比较,文艺史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作用更大些,因为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比其他方面多得多。就抗日根据地而言,文艺资料也是相当丰富的。仍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例,这里曾是文艺人才集中较多和过往频繁之地,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游记、小说、诗歌、戏剧、歌曲等文艺作品。象著名作家丁玲、孙犁、康濯、杨朔等,在抗战时期都写出了很有影响的作品。魏巍、田间、郭小川、管桦等著名诗人也以饱满的激情撰写了大量诗作。这些作品是作者的亲身体会,对于了解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对于研究根据地社会史,都是最生动,最丰富的见证资料。

以上拉杂谈了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以及为什么要研究、如何研究等三个方面的问题,目的是想借此促动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因属初谈,难免天真幼稚,但如能引来同仁参与讨论和研究,也算不枉初衷!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系)

参见冯健男等:《晋察冀文艺史》,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年;魏巍主编:《晋察冀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